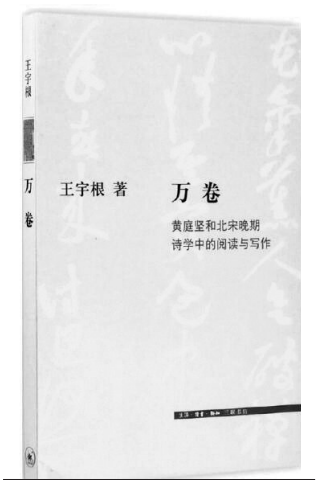


# 书籍史视角下的黄庭坚

张永涛

**提示** 北宋中晚期，雕版印刷逐渐取代手抄，成为书籍生产和消费的主要形式，在这样的背景下，“万卷”作为藏书或阅读数量都成为较易达成的现实。受此影响，以阅读为起点和根基的创作宗旨和方法，渐渐成为当时诗学理论和写作实践的主流，而黄庭坚因其本人独特的诗学感受力和个人性情成为这一转型期的代表人物。王宇根《万卷：黄庭坚和北宋晚期诗学中的阅读与写作》以黄庭坚的诗学理论和写作实践为例，分析印刷物质文化之变与诗学之变的关系，进而论述阅读与写作的关系。这一课题，有助于我们认识当下正在经历的从传统纸媒阅读到数字化阅读的转变。



## 破万卷只是杜甫的豪语

很少有人否认杜甫是一个“下笔如有神”的诗人，但他“读书破万卷”的豪语，却是可以被合理质疑的。杜甫生活在抄本的时代，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在他去世100多年后才出现。抄本形态的书籍，是难得的奢侈品，以至于藏书成为皇室对文化的垄断象征，《汉书·艺文志》之《七略》、《隋书·经籍志》之四部都是皇室藏书目录。梁元帝萧绎在围城中将十四万卷藏书付之一炬；新兴的唐朝用船调运隋室八万卷藏书却倾覆于黄河，事后图书管理官员声称，隋炀帝托梦给他收回了自己的藏书。这类极端偏执的帝王藏书故事，恐怕正说明了当时书籍的奢侈品属性。对于抄本时代的绝大多数读书人，比如杜甫，“读书破万卷”是强调阅读之于写作重要性的修辞术，是理想化的阅读目标。

北宋中晚期，随着雕版印刷的普及，印本逐渐取代抄本，欧阳修《苏軾对此都有亲身体会。欧阳修《记日本韩文后》说自己幼时家贫，曾从大姓李氏家中求得六卷破旧的《韩愈文集》。这一事例常被称为表彰勤奋而力学，其实完全可以作为书不易得的证明。而他晚年自号“六一居士”，“六一”一即为藏书一万卷，这固然因其经济条件的改善，但更在于印刷改变了书籍的奢侈品属性。同样，苏轼年轻时手抄《汉书》，可以理解抄本时代阅读惯性的强大遗存；左思《三都赋》之所以造成洛阳纸贵，不就是因为人们抄写好书的阅读习惯吗？他为黄庭坚舅父李常写过一篇《李氏山房藏书记》，说犹记当年老儒先生们“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而“近岁市人

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乌台诗案”的一大诱因，恐怕也是苏轼反对新法的诗文被刊印发行，急速放大了言论影响力，对朝廷造成了在抄本时代从未经受过恶劣舆情。

## 黄庭坚的成功实践

物质技术的进步，使得“万卷”的象征意义正在被实化，欧阳修藏书一万卷，李常藏书九千余卷，更年轻的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中记载的藏书数量是两万卷，这还是金人南侵之际。

渐趋成熟的印刷文化打破了手抄文化中长期形成的读者与文本之间的平衡关系，当时的读者和作者如何因应并重建印本时代的平衡，无疑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命题。王宇根《万卷：黄庭坚和北宋晚期诗学中的阅读与写作》回应了这一命题。他认为，黄庭坚以技法为中心、以阅读为根基的新诗学，是重建印本时代读者与文本之间平衡关系的成功实践。书籍从奢侈到易得，“万卷”从理想到现实，读者、作者既要多读苦读，又要寻找典范，还要创造性继承。用黄庭坚的术语表达，多读是“无一字无来处”，苦读是“雾豹”，典范是“斧柯”，创造性继承是“夺胎换骨”“点铁成金”。

回复后辈同学时，黄庭坚最常强调的是增广阅读量，他曾告诉外甥甥洪驹父读书少会导致目光短浅：“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王宇根发现，在抄本时代，读书往往被仪式化地描写为一种休闲悦读行为，比如陶渊明“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时还读我书”，刘春虚“闲门向山路，深柳读书堂”，体现的

是阅读的文化象征意义；而印本时代，读书的现实功利性大大加强，黄庭坚诗中即有“读书用意苦，呕血惊乃翁”这样惊心动魄的描写。《列女传》记载，陶荅子之妻对丈夫在治理陶地三年中由贫变富而获得的巨大财富深感不安，遂以南山豹隐的故事劝诫丈夫惜羽毛、远避灾祸：“妾闻南山有玄豹，雾雨七日而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泽其毛而或文章也，故藏而远害。”黄庭坚因此成了一个通过苦读而熬出好文章的隐喻，“南山浓雾豹成文”与“江湖夜雨十年灯”形成互文，是一种对苦读状态的描写，也是对苦读功用的声明。对“雾豹”的创造性继承运用，形象地演示了“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的创作目标是如何被实践的。

## 印本时代的阅读鄙视链

抄本时代，每个抄手都是编辑，文本开放易变；到了印本时代，博采众本加以校勘形成所谓“善本”是通行也是必行的做法。黄庭坚15岁那年，《杜甫诗文集》首次出现印本，即王洙通鉴“秘府旧藏”和“通人家所有”的多种公私所藏杜集抄本进而校勘结集，后由王琪刊刻的“二王本杜集”，这一善本遂成为后世各种杜集的祖本。围绕此本的刊行，范成大在《吴郡志》中记载了一个有趣的故事：王琪任苏州知州时，从省库借钱修建府衙，因无钱还账，才取“雕校素精”的这部家藏杜集，镂版印万本，每部为直千钱，世人争买之，富室或买十许部，既尝省库，羨余以给公厨”。这个故事既说明了印本市场的繁荣，也说明时人对善本的热情。

在文本供应大增的情况下，

消费一方在阅读尤其是写作时，也要像生成善本一样确立典范。众所周知，后人把黄庭坚列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的三宗之首，而那一祖就是被作为典范的杜甫。黄庭坚曾问另一个外甥洪龟父喜欢自己哪些诗篇，洪龟父举出“蜂房各自开门户，蚁穴或梦封侯王”“黄流不解涓月明，碧树为我生凉秋”，且以为“绝类老杜”。《诗经·邶风·伐柯》有云，“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意指伐取新斧，正好有旧斧在手作为样板。黄庭坚遂常以斧柯表达写作需要确立典范，并辅以规矩、绳墨等木工用词，暗示阅读和写作是一门技术活儿。

千年之后的我们，又面临一次阅读媒介大变革，传统的纸媒日益受到数字化阅读的挑战，自印本以来，在文本与读者之间已维持千年的平衡又一次被打破。印本取代抄本，虽然书籍供应数量大增，但并未带来质量下降，相反还生成了许多质量更高的善本。数字媒介一方面因摆脱物质限制导致文本供应量无限放大，一方面重构了文本生产方式，比如自媒体的出现。大量芜杂的文本进入阅读场域，这一次的失衡是与失序相伴生的，“开卷有益”不再被乐观地视为理所当然，更多的人愿意选择“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保守立场，读书成了一种很难取得共识的行为，阅读鄙视链呈现又加大着读者之间的分歧。一个人阅读质量的高低，史无前例地要靠他的写作来检验。在这样的背景下，黄庭坚关于阅读写作的理论与实践，被赋予了当代史意义。确立典范明示我们的要去芜存菁、去伪存真，还暗示着在书籍之海中要克制贪多务得的欲望。“夺胎换骨”提醒我们注意对典范的创造性继承，以应时代对写作赋阅读于意义。

# 考古人的学问与文章

饶佳荣

说起“考古”，最常见的误会就是把它跟“盗墓”“挖宝”相提并论，要么就是等同于“古董”“鉴定”。记得我参加高师那个暑假，一个念过大学工科的邻居大哥得知我填报了“历史系”，马上就问，如果学会了鉴定古董，以后肯定能发财。最近有一个农村留守女孩考上了北大考古文博学院，一时议论纷纷，没想到“考古”以这种方式上了热搜。稍早几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郑嘉励先生因为一句“上班就是上班”，转瞬成了网红。现在，还不知道疫情何时会结束，我在东京一个靠近山谷墓园的地方，静静地读着《考古者说》，开篇即《上班就是上班》，真是很有意思呢。

本书篇幅不大，内容却很实在——这大概跟作者脚踏实地的“考古”作风有着密切的关系，既能跑遍浙江全省

“挖坑挖土”，且善于读书，处事还很干练，所以书中的文字一点都不“漂浮”，大约说得上“句句有来历”——有人情世故的阅历，有字斟句酌的磨砺。难得的是，作者对学问本身亦有清醒的认识，这不仅是指学问的一套工作程序，还包括学问的表现方式——有的人以高头讲章自鸣得意，有的人以期刊论文为无上荣耀，有的人以科普小品为毕生追求。文本本无高下之分，如果都能尽心竭力，发挥一己之长，大概都能留下一些成果。

该书分为四编。“寻墓”编主要是关于浙江宋墓的调查与研究，“是我较有心得的部分”。读《上班就是上班》，可以感受作者行文的收放自如。的确，这是将“考古、历史、读书、工作经历、生活体悟和个人情感”冶于一炉的“五味杂陈的文字”。《国宝·重光》是一篇解说

词，介绍淹没了近800年之久的南宋徐渭礼文书。这件文书的出土在当代宋史研究上也堪称浓墨重彩的一笔，值得细细品味。像这样兼顾学术性和可读性的，书中还有不少篇什，比如“读城”编开篇《浙江城市考古漫谈》，作者从考古的角度出发，将浙江的城市分为“旷野型城市”“古今重叠型城市”，又说：“古今重叠型城市”的考古工作，总结起来，只是两句话：一是平面找布局；二是纵向找沿革。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是无止境的事业。简明通达的背后是作者的“真知灼见”。“读城”这一编读下来，宛如在两浙走了一遭，对那片钟灵毓秀的土地多了一些了解。不过，要真正“看透”文中的意思，非跟作者一样骑单车、下田野、问老乡不可，正所谓“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 波托茨基和他的手稿

简平

我在阅读扬·波托茨基的融合了志怪、魔幻、戏谑、荒诞、幻想、冒险、爱情、哲学等各种叙事类型的长篇小说《萨拉戈萨手稿》时，一直以为遇到了一位“后现代派”作家，待放下厚厚两大卷的书后，想了解一下这部读起来完全像当代小说的作者究竟是哪路大神时，才发现他1815年作古了。

我很难以文字来简要叙述这部高达900多页的浩浩汤汤的亲笔小说，反正，就如书中所说：“亲爱的阿方索，我们来到这里并非因为偶然……我们在等你”。结果，我们与瓦隆卫队的年轻上尉阿方索一起等来的是一——他去马德里加入他的军队，但很快发现被困在了一家神秘的路边客栈，和形形色色的怪人待在一起，他们中有小偷、强盗、贵族、吉卜赛人……他在66天里记录下了他们的故事，环环相扣，组成了一个故事，环环相扣，组成了一个根结结实实无法被拆分的链条，让人欲罢不能。虽然“嵌套小说”早前就有，但是，每一个故事都可自成框架，然后再再导出新故事的

“连环嵌套”的小说形式，则是波托茨基创造的。

《萨拉戈萨手稿》是部使人着迷的充满神秘感的小小说，波托茨基缔造了一座让所有读者都如堕雾里的迷宫，可丰富多样的叙事、多线并存的人物并没有使这座迷途宫摇摇欲坠，反倒是结构稳定，始终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我觉得书中众多的人物犹如一座座小桥，见到这些散布在全书各处的小桥，我们就能明白，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一系列的故事和一块块孤立的小天地，所有人物的命运其实都包含在同一个宇宙之中。我在阅读的时候发现小说里有个非常重要的主题，那就是“荣耀”因为它奠定了书中各个人的价值体系和存在意义。瓦隆卫队的上尉、盗匪佐托、大商人苏亚雷斯、身为乞丐但气质高贵的阿瓦多罗，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荣耀操守，也都有自己特定的道德标准。不过，波托茨基以令人叹服的方式让读者清晰地感受到，这各有千秋的荣耀操守虽能激荡书中的小世界，但却都有其局限、荒谬的一面，这种讽刺是极富洞察力并促人深思的。

这部叠床架屋的小说，其书名“萨拉戈萨手稿”就已构成了全书的第一层框架；读者将阅读到的一份于1765年放入一个铁盒的历史文献，1809年，它在战火中被偶然发现，随后由一名拿破仑

军队的军官翻译成法语。在我得知了作者波托茨基以及这部手稿的身世后，我认为这本身就是一部传奇而神秘的“萨拉戈萨手稿”。

波托茨基1761年出生于东欧的波多利亚，由于他母亲拒绝说波兰语，所以他接受了法语教育。17岁时，他赴维也纳，以骑兵少尉身份加入奥地利军队，后来又成为马耳他骑士团骑士，参加了对北非巴巴利地区的远征。波托茨基有一种浪迹天涯的情结，他加入考古远征队后，去过匈牙利、塞尔维亚，由此对斯拉夫世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荷兰发生反对威廉五世的起义时，他去到那里；他还赴莫斯科参加了沙皇保罗一世的加冕典礼，随即游历高加索；他甚至作为学术负责人，参加了一个由240名成员组成的旨在与国建立友好关系的使节团远赴中国。波托茨基不仅是位旅行家，走遍了欧洲大陆，他还是位外交家、政治家，曾被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任命为外交部部长官员，而在波兰受其邻国觊觎时，他表达了对普鲁士的敌视态度，还拿出钱来用于波兰更新武器装备，进入波兰国会后，积极倡导独立自由的政治主张；当俄军入侵波兰时，他则向国会递交了一份全民征兵的提案，并作为志愿兵加入了立陶宛军队。我觉得被波兰国王称之为“我们的头号雅士”的波托茨基，骨子里是个浪漫的向

往四处飞翔的人，所以，1790年，他成为波兰第一个乘坐热气球的人。当他乘着热气球在华沙的天空上飘移时，我想，他的确比别人看到了更多的人、更多的事、更多的世界，而这一切注定会被他写入自己的手稿，他将用千变万化的视角，为人们展示一个世界的全貌。

波托茨基是从1797年开始用法语撰写《萨拉戈萨手稿》的，连他自己都没想到，这将是一次漫长的写作，直到生命结束。1804年，在彼得堡以校样形式印刷了《萨拉戈萨手稿》第1天到第10天的内容；次年，同样以校样形式印刷了第11天至第13天的内容，但它们都从未进入发行销售的渠道。1807年，波托茨基决定彻底告别政坛，回到波多利亚。离开彼得堡时，他将一份手稿交给法国大使馆一个叫加布里埃尔·艾德蒙·卢梭·德·圣艾尼安的官员，这份手稿即为《萨拉戈萨手稿》前22天的内容。之后，他饱受病痛折磨，负债累累，还与妻子离了婚，但他坚持写作。1809年，在莱比锡以“莫雷纳山脉冒险记”之名出版了《萨拉戈萨手稿》开篇的译本。1813年，在巴黎出版了《阿瓦多罗》，第二年，又紧接着出版了《阿方索·范·沃登生命中的十天》，这是波托茨基生前出版的仅有的两个法语节选本，从中可以窥知，小说的前56天最早是在1812年写完的。

## 聊书

### 哲学书也可妙趣横生

高爽

有多少人被今年那篇浙江高考满分作文《生活在树上》给镇住了？除了大量生僻词语，还有一众哲学家的出场，海德格尔、麦金泰尔、尼采、维特根斯坦……看得人云里雾里。

说句不太厚道的话，这篇作文提供了装深沉的一个绝佳版本：“生僻词+哲学家”。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个特别不好的影响，会让更多人视哲学为畏途。

读哲学书确实需要门槛，这源于长期阅读积累下的文字理解能力、分析和思辨能力，但绝对不应该宥于生僻的名词术语甚至人名。而哲学书籍阅读的最大魅力也正来自于思想之美与逻辑之美。一本好的哲学书能够让人带着好奇走入思维迷宫，收获找到出口的乐趣。在此之上，如果作者还能写得文采斐然，那就更是意外的惊喜了。

今天要推荐的这三本哲学书籍就是如此。

当知道作为哲学家的赵汀阳，同时还是一位厉害的漫画家，一下子就明白了他的文字为何如此精彩。这本《四种分叉》，只是一本薄薄的小书，应该算是哲学随笔。“分叉”一词借用了博尔赫斯小说《小径分叉的花园》的用语，寓意一张包含一切可能性的多维之网又生成无数未来。话题直指当下，从《人类简史》等畅销书和人工智能等热门话题出发，展开对时间、意识、伦理和智能四个方面“分叉”的追问。引用书的“序言”中一段文字，足以说明一个真正的哲学牛人是如何用简单明了的语言来阐释自己的思考的：“世界明摆着，事物也明摆着，却没有一个问题是在明摆着的。孔子曰：‘天何言哉？’存在无言，人为存在选择问题。人能提出问题和制造问题，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但肯定为必然的存在开启了可能之命运，把无事的世界变成有事的世界，把自然的生活变成人文的生活，为事实赋予价值，将时间化为历史。”

## 《四种分叉》

## 《灵之舞》

邓晓芒的《灵之舞》同样是一本哲学小书，或者说是一部对文学和文化进行哲学评论的书。正如邓晓芒自己所说：“它”不像那些严肃的学术著作对某个问题作一种纯粹概念的分析，而是讨论一些普通人感兴趣的话题，结合自己的人生体验和中外文学名著中的一些人物形象，来谈人性、人生、人格、自由和尊严等等问题。虽然谈的是关于人生和生活的问题，但没有鸡汤的味道，更像是苦药，只看你是否愿意去尝。正如作者所说，互联网上那么多有趣的信息，为什么还有年轻人肯来关注这种难读的纸质作品呢？可见一个民族，尤其是像我们这样一个古老的民族，思想的脉络是不会那么轻易断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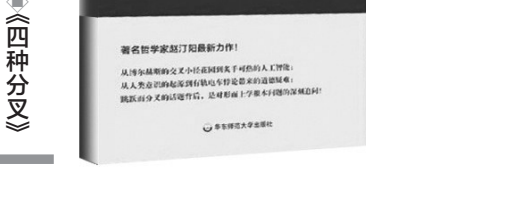
## 《中国思想史》

同样是探索我们这个古老民族思想的脉络，葛兆光的这部《中国思想史》，可以说是一次重写中国思想史或者说中国哲学史的新探索。与胡适、冯友兰版《中国哲学史》最大的不同在于作者对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理念。该书的导论部分，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由导论而自成一册，提出了很多新思路，比如：应当如何思考精英与经典的思想世界和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知识史与思想史之间应当如何互相印证，古代中国思想的终极依据或者说基本预设是什么，如何描述一般概念上的思想史低谷时代，等等。再多说一句哈，葛兆光先生还是国家教材委员会的专家委员，从他的文字及学术研究方法中，或许你也可以猜测出他对中学作文的写作态度。

## 《灵之舞》



## 《四种分叉》



## 《灵之舞》



## 《中国思想史》



## 《中国思想史》



## 《中国思想史》